

# 竭尽忠诚 为党为人民

——怀念段德昌同志

徐 国 森

段德昌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与贺龙、周逸群等同志一起，创建了中共鄂西特委、红六军和洪湖革命根据地。在同党内的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不屈，为党为人民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一九〇四年，段德昌同志出生在湖南南县一个只有几分地的穷秀才家庭里。自幼聪明好学，富有反抗精神。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就积极参加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组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雪耻会”。段德昌同志在南县按照“雪耻会”的要求，宣传和组织农民群众，向地主阶级展开禁止运粮外出、平折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减租和选举地方行政人员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段德昌同志又号召和组织南县的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在初期的革命活动中，段德昌同志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才能。

一九二五年秋，他受党组织的派遣，步行到广州，经毛泽东同志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当时，国民党右派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掀起了反共的恶浪，军校内形成左右两派学生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段德昌同志是反对“孙文主义学会”的积极分子，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因而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军校。随后，段德昌同志经周恩来同志推荐，进入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这个讲习班是一九二六年春为准备北伐训练干部而开设的，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等同志是讲习班理事，李富春同志是班主任。在这里，段德昌同志聆听了毛泽东同志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受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同年六月，段德昌同志从讲习班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作政治工作。

北伐战争开始后，段德昌同志随第六军进入湖南，接着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连政治指导员，不久，即升任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攻打武昌城的著名战役。一九二六年十月，段德昌同志结识了当时在北伐军中任代理团长的彭德怀同志。他介绍彭德怀同志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进行了党的教育。后来，彭德怀同志回忆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造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一九二八年初，他介绍

彭德怀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后来彭德怀同志领导平江起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同志受党组织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派遣，回到家乡南县和鄂西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南县首先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因敌人到处捉拿他，于是又化装成乞丐，经石首、公安到沙市。然后，他以沙市为立足点，东到汉川，西至宜昌，在汉宜公路各县活动，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已转入地下活动的党的积极分子取得了联系。这个时期，他经常住在沙市一个名叫刘子云的家里吊楼上，生活十分艰苦。有一次，刘子云到吊楼上去看段德昌，只见他一头长发，胡子好久没刮过，但双目却炯炯有神，睡在一堆稻草上，只有一床烂棉絮。段德昌请刘子云坐下，忙从一条很脏的口袋里摸出几个粑粑来给他吃。刘说：“你的粑粑脏死了，我不吃。”段德昌笑着说：“你吃吧，吃了叫花子的粑粑是不生病的。”经过多次接触，他们成了好朋友，段德昌才把真实身份告诉刘子云，并动员他参加革命，说：“如今全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起来斗争就活不下去，希望你和我一起去闹革命。”在段德昌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刘子云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如以炸野鸭子为名，搜集购买了不少洋硝准备自制武器，后来参加红军，当了军需。同时，段德昌同志又与隔壁一个铜匠交上了朋友，经常对他讲工人农民受压迫的道理，使这位老铜匠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在刘子云和老铜匠的帮助下，他们秘密制造成功了几颗铜炸弹。有一天夜里，段德昌同志带了二十多个人，把沙市附近一个区团防围了，得了三条枪，这就是后来反动派在报纸上宣传的“段德昌三条驳壳枪起家”的由来。

一九二八年初，段德昌同志带着游击队去攻打公安的陡湖堤团防。他们的计划是，先拿下陡湖堤团防，胜利后就在公安一带打游击，用武装来恢复地方党组织。计划确定以后，段德昌同志带着二十多个人和三条驳壳枪秘密渡过长江，出其不意地冲进陡湖堤团防。当时团总不在，只有三十多个团丁毫无精神准备，一个个呆若木鸡。段德昌同志两手一叉，站在屋子中央对团丁们讲：“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为穷人打天下，只要你们不顽抗，我们优待俘虏。有愿当红军的跟我走，不愿的可以回家。”就这样不战而胜，缴了敌人二十多条枪，并吸收一部分团丁参加了游击队。接着，段德昌同志就把这支红色游击队带到公安西北和松滋一带的弥陀市，澧市、黄金口、里甲口、班竹档、西斋、街河市、磨盘洲、米积台、沙道观等地打游击，用武装恢复地方党组织、扩大游击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公安县委组织起来了，段德昌同志担任了县委书记。

## 二

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一九二九年底，段德昌同志与周逸群同志一起，创建了鄂西特委、红六军和洪湖革命根据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八年初，党中央派贺龙和周逸群等同志到洪湖地区建立了湘鄂边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的武装斗争。不久，贺龙、周逸群同志和前委即转移去湘鄂边的桑植、鹤峰、石门地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后来，他们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苦竹坪被敌重兵打散，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失去联系，分开活动。

一九二八年四月，周逸群同志从湘鄂边到沙市，与段德昌同志取得了联系。由于段德昌同志在这一带有广泛联系，很快就把附近几县党的负责人召集起来，成立了鄂西临时特委。五月下旬，在宜昌正式成立鄂西特委。这时，原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同志和游

击队负责人肖仁谷相继牺牲后，鄂西特委实际已不存在，由沔阳县委谭汉藻同志与鄂西特委联系，成立以沔阳为中心的五县联席会议，洪湖地区从此就属鄂西特委领导。段德昌同志参加了鄂西特委的筹备工作，被选为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鄂西特委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加紧发动与组织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利用当地尤其是洪湖地区有利的自然条件，开展游击战争。

会议以后，段德昌同志仍回江陵、公安、石首一带扩大游击战争。同年夏天，鄂西特委将所属其地游击队，统一编为洪湖游击大队，段德昌同志任大队长兼特务队长，下设两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广泛驰骋于洪湖与鄂中地区，把这一地区党和群众组织进一步发动起来。据周逸群同志当时给中央的报告说，这时鄂西特委所管辖的地区已有二十三个县，有组织的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党员达到二千多人。

一九二八年底，党的“六大”决议和中央的重要指示传到了鄂西特委，例如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分配土地、在地方和军队士兵中发展党员等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传到了鄂西特委。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鄂西特委的大多数同志特别是段德昌同志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一九二九年二月，鄂西特委为贯彻“六大”会议精神，在江陵沙岗召开扩大会议。特委在讨论今后工作方针时，段德昌同志认为：洪湖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东临武汉，西通巴蜀，经过大革命洗礼，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又有很好的自然条件；这里湖泊很多，河堤纵横，港汊交错，芦苇丛生，天然资源丰富，有利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因此段德昌同志建议，以毛泽东同志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坚持斗争，逐步发展，必然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的建议被特委采纳，决定先用很短时间把江陵、石首、监利的赤色政权建立起来，然后立即进入洪湖中心区，以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这次特委会上，段德昌同志又一次当选为特委委员，兼管特委妇委的工作。不久，特委军委邹资生同志在沙岗战斗中牺牲，段德昌同志改任特委军委。

会议以后，段德昌、段玉林率领游击队在十七天内打了二十一仗，虽然沙岗一战损失很大，但终于把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的赤色政权建立起来了。三月初，特委决定段玉林同志仍留江、石地区，建立以白露湖为中心区域的根据地。段德昌同志则回到洪湖，建立以刘家场、柳家集、福田寺为据点的洪湖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根据这一决定，段德昌同志带领游击队从监利一区出发，分两路打五处常练队，最后在螺山合围解决了最反动的李生灿“铲共团”（又称“白极会”）共得枪三十五支。五月攻打毛家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多支，机枪二十挺，接着攻占峰口、仙桃。尤其是峰口一战打得很出色，段德昌同志带领游击队用梯子、杉杆，马刀攻城，砍断电线，通过树枝水域、墩沟等多种障碍物，摸进敌人营房，乘其不备，迫使敌人全部缴械，得枪二百余枝。七月，在调口成立鄂西总部队，周逸群同志任总队长，不久即由段德昌同志接任。这时，敌三十四师岳维峻部来犯，段德昌同志以“只打虚、不打实，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战术，击溃敌人一个团，迫使敌人停止侵犯。至此，洪湖中心区域已经形成了。十二月，鄂西特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洪湖根据地的游击队，编为中央独立师，共有枪一千多条，人员五千，段德昌同志任师长，独立师下设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一鸣，第二纵队司令段玉林。当时地方上在段德昌同志的组织下，一九二九年开始建立了洪湖的“水兵”

即赤色守备队，以区为单位，活动于各水口。

独立师成立以后，鄂西特委原令一、二纵队于十二月底到江陵集中，后因省委指示一纵队向汉川推进，延误了集中时间，直到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两个纵队才会师于监利西北的汪家桥。根据中央指示，当天下午开了一个大会，由周逸群同志宣布成立红六军，军长由中央派去的孙德清同志担任，周逸群同志任军政委，段德昌同志任副军长兼一纵队司令，许光达同志任参谋长，段玉林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

红六军成立以后，经过短期整训，即分别出击，扩大根据地。第一步攻下了普济观、郝穴、龙湾、老新口、新沟咀、府场、峰口、朱河等，这样就把江陵、潜江、沔阳、监利四县的广大乡村联成一片了。第二步攻克沔阳、潜江县城，成立了县苏维埃。第三步向外扩大根据地，北攻仙桃、岳口、皂市、天门；东击汉川系马口；西攻沙洋。这时苏区扩大到汉水南北，使长江、汉水之间除沙市、监利城外，广大地区都变成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六军扩大到一万二千多人。五月回洪湖休整，改纵队为师。这时段德昌同志到上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 三

从一九三〇年秋到一九三一年底，段德昌同志与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再创洪湖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七月四日，红二军和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同志任军团长，周逸群同志任政委。邝继勋同志任红六军军长，柳直荀同志任政委，段德昌同志任副军长。红二军团在贺龙、周逸群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抓住蒋冯阎大战的有利时机，使洪湖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派来了执行立三路线的代表。他不顾贺龙、周逸群同志的强烈反对，强令红二军团脱离洪湖根据地，带走大批地方武装，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结果遭到失败。部队撤至松滋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这时，红六军军长邝继勋同志已调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段德昌同志从上海回来接任军长职务，并参加前委。十二月，前委在杨林市召开扩大会议，在讨论下步行动方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段德昌同志认为，当初我军置苏区于不顾，长途奔袭去配合打长沙，违背了游击战争的原则，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现在既已失利，苏区又遭到敌人大规模“围剿”，应将部队立即带回洪湖苏区，以还击敌人的“围剿”，再创洪湖苏区。但那个立三路线的代表则认为，洪湖湖沼太多，旋转不便，主张另创新的根据地。争论结果，前委同意段德昌同志带一些伤员和被打散的红军战士共十四条枪回洪湖。红二军团则进入湘鄂边活动，以后又北上转战于鄂西北，部队缩编为红三军。

洪湖根据地自红二军团被调去打长沙后，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少数地方赤卫队被敌人围在赵家海坚持芦苇斗争，只剩下三十多人，洪湖革命群众被敌人杀害八千人之多，人民日夜盼望红军早日打回来。段德昌同志从杨林市出发，边打边走，边扩大红军，终于在一九三〇年底，回到洪湖，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周逸群同志会合。不久，在杨林市战斗中与主力失掉联系的六军五十团、四十七团二营约一千人也回到根据地。周逸群同志和段德昌同志将这支部队与地方的几支小游击队和赤卫队加以合编，成立独立团，又

称新六军，段德昌同志任军长。敌人得知段德昌同志回来了，于是兵分几路向洪湖中心区发起更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我新六军。敌四十四师肖之楚和四十八师徐源泉先趋逼近洪湖，敌容景芳由新堤攻螺山，敌刘培绪坚守监利堵击，陈诚部也由岳州向洪湖开来，形势相当严重。针对这种形势，段德昌同志与周逸群同志决定把正规红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仍采取“只打虚，不打实”的游击战术，将敌人各个击破或挤出根据地。他们首先将群众普遍组织起来，成立了赤色警卫队，（主要是配合红军打游击），赤色教导军（主要是红军的后备队）、赤色守备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和肃反），经过适当配合和周密部署之后，新六军主力首先在连鱼须一战，击溃川军，军威大震。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攻峰口，消灭了曾楚材的保卫团，一两天之内占领了小港、小河口、汉口等地。接着攻新沟咀，缴枪一百多支，使敌人暴跳如雷，于是又用两个团的兵力向我反攻，我翻身一个回马枪，敌人大败，缴获迫击炮四门，缴枪二百余支，机枪两挺。四月十五日，敌见我新六军向江陵、潜江移动，以为我要离开洪湖中心区，于是又乘机占领峰口、朱河。这时我新六军突然从龙湾、熊口杀回监利，在朱河击溃敌人一个团。四月二十四日又在监利余家埠打败徐德佐的第十三团，缴枪五百余支，迫击炮二门、轻重机枪五挺，俘虏敌连排以上反动军官两百多人，从而扭转了战场形势，敌人纷纷败退。五月二十八日，新六军又在瞿家湾的三宫殿歼灭敌军两个连。至此，洪湖根据地在周逸群、段德昌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得到了恢复。新六军由几十个人十几条枪，发展到两千多人，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段德昌同志任师长，陈培英同志任政委。这时，周逸群同志不幸牺牲了，领导重担就全部落在段德昌同志的肩上。

段德昌同志在与立三路线斗争中再创洪湖根据地，为党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段德昌同志作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优秀代表，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

#### 四

从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三年六月，段德昌同志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夏，长江涨大水，江陵、监利、沔阳、汉川百分之九十五的地方被大水淹没。蒋介石施以“水淹苏区”的毒计，掘堤灌水。八月二日，湘鄂西省委作出“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说因根据地水灾严重，部队给养困难，军事行动不便，令九师向天门、潜江发展，打击徐德佐部。根据这一指示，九师先后占领沙洋、荆门、天门、潜江。这时省军委在老周咀举行会议，关于九师的行动问题，除原决定外，又令其出击襄北，若能与红三军军部联系上时，就接红三军七、八师回洪湖，并开辟鄂西北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段德昌同志率九师向北出击。九月二十八日在刘候集与红三军七、八师会合。会合后，决定将教导团与地方游击队合编，成立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由柳直荀、汤慕禹同志负责，坚持鄂西北的斗争，军部则率七、八师下洪湖。七、八师先在青峰镇以南歼敌两个团，十月二日攻钟祥，占永隆河。九师则占领潜江，铺开大路，打通前方与后方的联系。十月八日，红三军军部顺利到达洪湖中心区。但在同一天，执行王明路线的那个钦差大臣竟以省委军委名义发布第二号训令，指责红三军离开房县是不要后方，反国

际路线；又指责九师去襄北接红三军七、八师，“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本身包含有冒险轻进的立三主义残余。”要给段德昌等同志处分。贺龙同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段德昌等同志的行动是正确的，胜利完成了任务，应当表扬。但那个钦差大臣借中央代表名义以势压人，强行给段德昌同志以警告处分。

段德昌同志在受到这种毫无道理的处分之后，毫不计较个人恩怨，英勇奋战。一九三二年初，敌以川军八个团，徐源泉六个团和二十四师联合向我洪湖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从一月二十六日起，敌四十八师特务团及蒋介石嫡系徐庭瑶的第四师第十二旅，向我襄北段德昌同志部进攻，贺龙同志令段德昌同志率九师及汉川独立团以围城打援的战术，在应城的龙王集一举歼灭敌四十八师特务团及第四师第十二旅全部，歼敌四千余人，生俘旅长张联华，缴枪三千多支，迫击炮二十门，机枪六十挺，这就是著名的龙王集大捷。三月上旬，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段德昌同志又参加指挥了襄北文家墩战役，歼敌四十八师一四四旅，生俘旅长韩昌峻以下三千余人。六月中旬，段德昌同志又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监利新沟咀将敌范绍增旅全歼，缴枪二千余支，俘敌三千，打伤范绍增，终于粉碎了“围剿”。龙王集、文家墩和新沟咀战役的胜利，充分表现了段德昌同志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军事思想。

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起，敌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及新三旅以何成濬为总指挥，徐源泉为鄂中司令，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战术，沿汉宜公路由西逼近。贺龙、段德昌等同志主张仍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然后各个击破。龙王集、文家墩和新沟咀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用这种方法是能够打破敌人这次大规模“围剿”的，但执行王明路线的那个钦差大臣听不进去，提出把运动战、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奋斗”，并发出了“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指示，强令红军死打硬拚。结果，红军屡遭失败，直到丢掉洪湖根据地，采取逃跑主义。十月，湘鄂西分局在枣阳王店开会，决定避敌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在这次被称为“小长征”的八千里大转移中，段德昌同志率九师负责阻击、断后，保证了大部队安全推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到达湘鄂边。但是，部队损失极大，由出发时的一万四千多人减少到九千人。段德昌同志对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极为痛心和不满，曾当面指责那个钦差大臣将来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 五

在湘鄂西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那个钦差大臣，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贯彻王明路线，而且根据临时中央的错误指示，从一九三二年秋到一九三三年五月，连续搞了四次“肃反”。那个钦差大臣断言，湘鄂西苏区隐藏了不少反革命派别，说什么“革命形势愈发展，反革命势力愈团结；湘鄂西苏区在执行国际路线以来，阶级斗争日益紧张激烈”，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在肃反中，他不依靠群众，不深入调查研究，大搞逼供信，把革命队伍内部的认识问题、是非之争、缺点错误，都与反革命阴谋破坏联系起来，造成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反对和抵制王明路线的段德昌同志也成了那个钦差大臣“肃反”的对象。

段德昌同志在被捕前就觉察到有问题，但他襟怀坦白，无私无畏，对周围的同志坚

定地表示：“在原则问题上我决不让步，我要斗争到底。”四月的一天，那个钦差大臣派人送信给段德昌同志，通知他到某地开会。段德昌同志一进屋，那个钦差大臣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罪状”来念。段德昌同志激愤地说：“不要念了，你们那一套我早已料到了。”又说：“我相信总有一天党的历史上会记载一笔，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那个钦差大臣不容分说，立即叫人给段德昌同志戴上脚镣手铐，随同前来的一个警卫排也被缴了械。然后，又卑鄙地以段德昌同志的名义通知九师排以上干部开会，全部逮捕，后来都被诬害了。

段德昌同志在关押期间，经常唱国际歌，多次同那个钦差大臣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义正词严地批评那个钦差大臣的错误，并要他“不要忘记党的领导，不要忘记洪湖人民，不要忘记我们的红军。”段德昌同志还常对同志们说：“我不能与你们一道战斗下去了，希望你们跟党走，战斗下去，消灭敌人，争取最后的胜利。”

六月十五日(古历五月二十三日)，那个钦差大臣通知各单位派代表到金果坪江家村开段德昌同志的所谓“公审”大会。那个钦差大臣给段德昌同志罗列的主要罪名是：主张恢复洪湖苏区，因为他曾说：“只要派一个营回去，群众就会支持我们把洪湖苏区恢复起来”，据此给他戴上了“阴谋分裂红军”的大帽子；更为荒唐的是，竟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污蔑段德昌同志“企图暴动”，甚至连不太习惯吃苞谷饭也成为一条罪状，非杀不可。段德昌同志发言坚决拒绝诬加给他的这些罪名，他说：坚持回到洪湖苏区，这是我的主张，我现在仍然不变；至于说我“企图暴动”，是有意陷害，不是事实；有的战士说“面面饭(即苞谷饭)吃了肚子痛”，当时感到对战士教育不够，也是真况，你们凭这些定罪，我不服。最后，段德昌同志含着眼泪说：“即便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反革命，我对党是忠诚的。”那个钦差大臣逼着大家表态，贺龙同志站起来说：“德昌也是洪湖的创始人，威信高，他领导的部队很能作战，杀了德昌，党要脱离群众。”那个钦差大臣根本听不进去，蛮横地说：“这是分局的决定。”贺龙同志听了十分痛心，手把着段德昌同志的肩膀，热泪纵横，泣不成声地问：“你还有什么话说？”段德昌同志坚定地说：“你赶快派部队回到洪湖去！”参加“公审”的代表，个个低头抽泣。下午五时，段德昌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苏维埃！”壮烈牺牲了。

段德昌同志被王明路线诬害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湘鄂西人民的心中。党也一直惦记着段德昌同志，后来为他平反昭雪，并给予崇高的评价。一九五一年八月，周恩来同志指示中央组织部了解段德昌同志的详细情况。同时，谢觉哉同志在与段德昌同志的亲属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段德昌同志对党有很大的贡献，并提议将烈士遗骸移葬北京。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根据六届七中全会精神，由毛泽东同志给段德昌同志签发了中共中央第一号“烈士证”，并通知鹤峰县委立碑云：“段烈士生平为革命，竭尽忠诚，茹苦含辛，效劳祖国，……他虽身死，但革命精神却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周恩来同志还多次指出，段德昌同志是洪湖苏区创始人和正确路线代表之一，苏区人民怀念他，要宣传他的革命事迹。至今，许多当年的红军老战士和老游击队员，提起段德昌同志无不交口称赞，谈到段德昌同志的牺牲时，往往泣不成声，表示深深的怀念。我们怀念段德昌同志，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的高尚品德，认真总结那一段历史教训，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四化，团结起来向前进。